

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

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

冒志祥 著

广陵书社



以外交文书形态剖析宋朝外交格局，阐释文化内涵，挖掘文化软实力对宋朝外交的意
义。本书拓宽了中国古代专门文书的研究领域，对以国际视野探究宋朝文化以及研究宋朝
制度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

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

冒志祥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 / 冒志祥著. — 扬州：广陵书社，2012. 3

ISBN 978-7-80694-809-5

I. ①宋… II. ①冒… III. ①外交—文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D82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5354号

书 名 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

著 者 冒志祥

责任编辑 顾寅森

出版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809-5

定 价 35.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摘 要

宋朝有几个显著特点：文化高度繁荣，文人政治明显，国力尤其是军力相对较弱，北方一直并存着强大的辽、金等政权。基于上述特点的宋朝对外交往，呈现出特别的形态。

唐宋对外交往是建立在以华夏文化为轴心的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大交融之中的特殊形态的国家交往——以文化为基础的王道睦邻外交。唐与宋创造出的辉煌的文化成就，使它们理所当然成为这种王道睦邻外交的核心。而唐与宋文化成就相同、睦邻外交追求相同背后因国力不同形成的外交差异，又提醒人们特别关注宋朝的对外交往。研究宋朝的特有睦邻外交追求和实际成就，从中不乏现实启示意义。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外交概念有别于今天，外交主体的“国家”，相对于今天来说，既可能仍然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如高丽、日本、暹罗等，也可能已经成为了我国现在的一个民族，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中华民族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了。在这里，选取外交立论是基于一种狭义的理解，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个“朝代”的对外交往的研究，找寻历史规律，发掘历史本质，为今天的对外交往提供帮助。

外交文书是外交工作的载体。作为官文书的种类，外交文书

与一般的官文书相比,既有相同的要求,又有特殊的个性。如格式要求严格,规范化要求程度高等,这些都是文书本身的共同点。但外交文书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交往,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政体特点、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等,对外交文书又提出了自身的特殊要求,外交文书的形成也较一般文书更为复杂,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也有别于一般文书。因此,研究外交文书,就是重点挖掘这类文书的特殊性。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造就了“盛唐隆宋”的文化繁荣局面,但也导致宋朝的机构臃肿、冗员激增、武备废弛、国力空虚等。而以农耕为主的宋朝与以畜牧为主的辽、金、夏等朝的矛盾冲突,以及宋朝从未统一过北方的社会现状,加之宋朝试图延续所谓华夏“传统礼治外交”的努力,使得宋朝外交陷入了尴尬、混乱甚至非理性的局面。宋朝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既有汉唐大国礼治外交的延续余脉,又有对传统礼治外交的批判和瓦解甚至颠覆。

宋朝外交文书文种相对固定,变化不大。如誓书、盟书等自春秋战国至我国现代外交的产生,几乎一直沿用。增加的文种主要有札子等。文书的体式更加规范,撰制过程要求更为严格。但无论是文种、格式还是撰制过程,都打上了严格的外交的烙印。如外交文书多以皇帝或“国家”的名义出现,“国家”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着外交行为和外交文书,未经允许或授权,地方政府不得对外藩用书。外交文书的文种选择、体式表达等,体现着外交行为涉及“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文书文种的职能,与国(朝)内单纯使用的官文书大不相同。外交文书的一个细节、一个落款、一个标点、一个用词……都可能引起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外交文书的撰制必须慎之又慎。

宋与辽国、宋与金国、宋与高丽、宋与西夏是不同的外交模式。尽管宋与辽、金、西夏发生过大小不等的军事冲突,但宋与辽基本

上是平等外交关系,宋与金是臣与君的外交关系,宋与西夏和高丽是君与臣的外交关系。透过宋朝与他们交往的文书,可以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外交规律。

外交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民俗学、社会心理、宗教哲学等密切相关。用新的视角去审视外交文书,可以看到外交文书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价值。

外交文书的研究,对我国当今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以“国际”视野研究外交文书,鸟瞰宋朝的文化艺术成就,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宋人的文学、思想、思维,更为全面地分析宋朝的社会状况和对外政策,更为全面地探讨宋朝的内政外交。

“应用文体学”博士文库序

一

应用文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处理公私事务所使用的具有惯用格式和直接实用价值的文章。

写作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活动,所有的写作成品——文章——都是有用的,只是其用途各有不同:文学作品的作用主要是发现美、表现美和传达美;新闻文体的作用在于及时客观地报道事实;各类教科书和科学论文的作用是传递知识、发现和运用规律,提高人们的知识和能力素养;而应用文的作用则是解决具体事项。直接用于解决问题,具有切实的功用性是应用文的本质特征,该特征使得应用文卓然不同于其他类别的文章。

应用文体源远流长,自有文字始就有了应用文。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力和目的都是生活和劳动的需要,记录事项、传递信息、发布政令、管理社会等现实的需要促使不同地域的很多种族不约而同地创造了文字。可以说,人们创造文字的最初目的和主要目的在于实用,用以解决各种问题。文章的其他功用是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需要的不断丰富而逐步派生出来的。中国最早的文献——甲骨文和钟鼎铭文、中国最早的文集——《尚书》,其中的文章很

多都是应用性文章,这已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不用说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少不得各种应用文,即便是一个人,甚至大字不识的文盲,其一生中也无法与应用性文章完全绝缘。在文章的王国中,作用之广泛、作用之持久、作用之强大、作用之直接的文体无出应用文之右者。考诸历史,可以发现,在人们所写的各色文字、文章中,应用文所占比例最大。尽管由于其应用性所导致的与具体时间和事件关联性极强的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应用文因世易时移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仍有大量的应用文章留存至今,其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现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更是须臾离不开应用文。大到国家政策方针,小到个人求职就业,哪个领域、哪个部门、哪个人可以离开应用文呢?我们可以闭目作一想象:在我们吃饭、睡觉、玩耍、散步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平凡时刻中,有多少支笔,多少台打字机,多少部印刷机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无数的报告、请示,无数的合同、协议,无数的借据、收条被拟写制作出来,这些纸页如漫天雪花,纷纷扬扬撒遍世界每个国度、每个团体、每个组织、每个家庭。

然而,遗憾的是:在学术界,应用文体却遭受了残酷的漠视。我们不去抱怨学科分化不明显的古代,就是在学科林立、学术研究几乎无处不在的今天,广阔的学术天地间也很难找到应用文体的立足之地。有人认为,应用文只是操作层面、技术层面的制作,因而“有术无学”;也有人认为,应用文只是对格式、模板“比葫芦画瓢”式的套用,缺少创新力;也有人认为,应用文功利性太强,是“假大空”的官样文章,所以不美。总之,应用文是进不了学界很多人的法眼的。

一方面,社会和个人都离不开应用文;另一方面,学者们又如此漠视应用文。咄咄怪事,谁之过?应用文,还是学界?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可喜的是,应用文体的

学术天空中,并非一片漆黑。大大小小的星星,或远或近,或明或暗地闪烁着,虽尚未形成耀眼的银河,但也点缀着广袤的夜空,给人以期冀和前行的力量!古代的文论著作,如《独断》、《文心雕龙》、《文章流别论》、《典论·论文》;文集,如《尚书》、《昭明文选》、《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正宗》、《古文辞类纂》、《经世文编》等;更有古代公文汇编,如《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名臣奏议》等,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应用文体资料。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书学出现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间,很多拥有现实关切的学者和不同行业的实际工作者致力于应用文的研究工作,涌现出数以百计的专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无论就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看,还是就研究主体看,应用文体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了。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为适应时代的需求,为整合已有的学术力量,为充分开发深厚的学术资源,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应用文体学。希望在这面旗帜之下,集结同道,将应用文体研究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

应用文体学是研究古今各体各类应用文的实质、功能、类别、特征、演变和制作、处理程序的一门新兴学科,是整合了历史学、文书学、文章学、文学、档案学、文献学、语言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资源,同时又有独立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交叉学科。

应用文体学的学科结构可以概括为包含“本体论”、“历史论”和“应用论”三个模块的“一体两翼”模型。

“一体”即“本体论”,内容包括应用文体的本质、特点、功能、种类、作者、内容、形式等方面,偏重理论阐释,解释应用文体学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揭示应用文体学的基本规律和规则,对应“应用文体学概论”课程。当今已有的“应用写作学”、“实用文体学”、“公文学”等均可纳入这“一体”之中。另外,还可以派生出“应用文体文本阐释”、“应用文体文本批评”、“应用文体阅读和接受”、

“应用文体社会学”等科目。

“两翼”是指“历史论”和“应用论”。“历史论”一翼发掘和继承数千年历史的宝贵应用文体遗产,主要包含“应用文体发展史”和“应用文体理论发展史”两个方面。前者研究古今应用文体的发展演化,总结文体演变的规律;后者则从大量的古代文论著作和其他典籍中寻找和整理应用文体的相关理论,寻绎其脉络,架构其体系,挑选其精华,服务于当下。另外,“历史论”还包括“文书工作制度史”、“文书工作机构史”等内容。“应用论”一翼突出应用文的实用性,强调对现实工作的服务性,主要包括“应用文书写作”和“应用文书处理”两方面内容,总结文书拟写、制作、处理、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技巧,普及并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规的内容,传授公私文书写作和制作的方法,提高社会应用文的使用水平。

应用文体价值的广泛性,决定了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文体学的多重价值。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人类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有应用文体的身影,我们可以从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管理学、历史学、档案学、文书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等很多方面和学科探寻应用文体研究的价值。受笔者学识所限,不能将应用文体学的所有价值尽数展示,这里只介绍其中主要的三个方面:实践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应用文体学的实践价值表现在对社会文书实践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是由应用文的实用价值决定的。应用文体运用于公私各项事务,发挥传递信息、商洽工作、领导指挥、请示汇报、沟通情感、凭证参考、宣传教育等作用。应用文体学发现并运用应用文体制作、运行和保管的规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服务于文书工作,提高文书工作的效率,因而具有了实践价值。

应用文体学的实践价值还表现在它对社会管理的作用。一方面,公务文书和私务文书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是国家管理者

“临民治世”的工具,是民众办理公私事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古今的应用文书中积淀和保留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教训,凝结了人类管理的智慧,是学习管理本领的重要参考。古人重视公文的汇编,重要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此,将前代优秀公文作品汇集起来,作为社会治理的“万世之龟鉴”。

应用文体具有务实、严谨、朴实的风格,研读和制作、使用这类文书,会使当事者渐渐养成做事扎实、求真务实的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这也是应用文体学重要的实践价值。

应用文体学具有多向度的学术价值。

首先是语言学价值。语言广泛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语境中,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会产生各具特点的风格、功能。应用文是语言的重要使用领域,该领域中的词汇、语法、章法、修辞、语体等很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是其他领域语言所不能替代和复制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各种应用文体,不仅是文体学的重要任务,也是语言学的重要学术阵地。

其次是历史学价值。应用文书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意识的副产品,是具有原始性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的各种活动及活动当中的思想、意志。因此,由各类实用文书转变而来的档案成为编修史志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来源。历史离不开重大事件构成的线和面,而这些重大事件无不被铭记于各种文书之中;历史更离不开具体而微的点,而这些点也密密麻麻地散布于各类文书里。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各种应用文书不仅可以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更可以用来补充、更正史书的遗漏和舛误,还可以丰富和细化更具意味的历史场景和细节。

第三是档案学价值。文书和档案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上的不同称谓,处在文件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一般而言,文书是档案的来源,档案是文书的归宿。文书和档案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联,也使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

分割。中国的文书工作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那时出现了专职的文书工作机构——太史寮,也出现了最早的档案馆——天府。自此以后,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就如同一对连体儿一样,彼此不离不弃。中间虽经唐宋时期的短暂的、并不分明的分化,但很快在元明之际重新合二为一。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发生改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文书即是档案,档案即是文书,文书工作即是档案工作,档案工作即是文书工作。应用文体学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存在交叉,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彼此可以互相补正,互相促进。

第四是文章学价值。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文章学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颇具人气的新学科。文章学的研究对象为狭义的文章,即文学作品之外的文章。文学作品之外的文章,其主体乃是各类公私文书,即应用文。所以,文章学与应用文体学之间关系至为密切,研究对象十分接近,只是所取的视角和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两个学科之间,可以互相仰仗的方面多矣。

应用文体以事功为旨归,所以往往给人一种死板凝滞、干瘪乏味的印象。其实,事实并不尽然。略加考究,我们就能发现古今应用文在不少方面具有审美的价值,有的像艺术品一样情趣盎然,耐人玩味。

应用文体的审美价值之一是其文学性,其中可做代表的是古代公文。“学而优则仕”的选人方式使得古代公文作者的主流——官吏——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杂文学的观念、美刺的文学传统使得公文和文学直接交融,人治代替法治的社会制度使得古代公文具备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一切最后形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古代公文具备较强的文学性,不少公文名品成为古今传诵的文学经典。古代公文中的判词、檄文更是处于文学和公文的交叉地带,注重辞藻、用典和夸饰,气势磅礴,摇人心旌。公文之外的诔、铭、箴、墓志铭、文人尺牍这些应用文,更可以直接看作文学作品。

这些公私文翰所包孕的丰富充盈的情感、生动如画的场面、精警动人的语言、眼花缭乱的修辞,使其灿然立于文学之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应用文体的审美价值之二是其形式美。应用文的载体物质有甲骨、竹木、缣帛、金石、纸张,这些物质材料有的古朴雅致,有的华美绚丽,有的端庄肃穆,风格各异,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从历史上看,应用文主要手工书写,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风格,或古雅或流丽或厚重或清新,变化万端,不一而足,具有很强的书法美感。更有不少文化名流、书法大家也曾拟制过很多应用文章,是书法艺苑的奇葩。应用类文章多使用印章,从春秋战国直到今天,此传统连绵未绝。如果将这些印章集汇在一起,当是一个多么炫美的篆刻艺术画廊!就整体而言,应用文体,格式规范、布局整饬、庄重沉稳,呈现一种成熟、理性的美。

二

南京师范大学应用文体学专业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应用文科”和“涉外文秘”两个应用型文科专业和之后建立的“高级文秘”本科专业。2000年,在本科专业之上创设“应用文体学”硕士点,并开始招收硕士生。2003年,在文艺学博士点下面附设“古代文牍学与当代应用文体学”方向并开始招生。经教育部批准,2005年独立为“应用文体学”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开始招生。2007年开始接收“应用文体学”博士后。专业还招收了两名韩国博士生。在应用文体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从文艺学受益颇多,其孵化、培育、扶持之功不可磨灭。

三十年的风雨,三十年的耕耘,三十年的悉心培育,终于绽开了鲜艳的花朵。时至今日,南师大已经健全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的秘书学类、应用文体类的完整学位学历序列,建立起了科目多样、内涵丰富、卓有成效,把教学、实践和科研融为一体

的应用文科学科体系。

把握时代的脉搏,紧跟社会的需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人才培养特殊需要相结合,寻找学科发展的增长点,适时调整学科发展方向,一直是应用文体学学位点的努力所在。值得欣慰的是,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的努力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同仁的认可,学科建设的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确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最近在文学学科门类下增设秘书学专业,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师大应用文体学专业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科点的工作实绩,首先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应用型人才。文体学专业除学习中文专业的基础、公共课程外,主要开设“应用文体学”、“中国秘书史”、“公文发展史”、“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古今公文研读”、“古代文牍选读”、“文牍批评史”、“公文文体研究”、“当代实用文体学”、“中外秘书比较研究”、“秘书文化学”等专业课程。

该学科既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习练,增强处理实务的能力,又重视学术能力的发展,真正做到“理论深度结合实践”。毕业学生既可以到机关、企业担任高层文员,也可以到高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科点工作成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南师大应用文体研究,从古代公文着手,向当代公文、社会应用文拓展。研究方向主要有古代公文、古代其他应用文书、当代公务文体、社会应用文体、秘书学史等,逐渐形成了基于中文基础,以古今实用文体作为主要学术聚焦点,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制度史相结合的特色,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我们的研究注重古为今用,强调服务当下,注重学术研讨与社会运用相结合。

经过整个团队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涌现出一批科研成果。仅自 2001 年以来的十年间,除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之外,出版学术著作近 20 部,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其中权威和核心刊物文章占总数的 50% 以上,有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承担科研课题 10 余项,其中省部以上级项目 4 项。

三

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集结并培养了一批致力于应用文体研究的专业人员。

应用文体学的研究对象、特点和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几项素质:一是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包括古代政治制度、官制设置、选举方法、古代文论、古代文学、古代文献等方面;二是系统的古今应用文体知识,包括历代文体的名称、种类、功能、特点、演化、制作、处理等方面;三是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语言学知识,包括对古今文献的阅读能力,较强的写作能力(包括常用应用文书的写作能力),系统的词汇、语法、修辞、章法知识;四是文献学修养,包括对古籍的版本、流变、存灭情况的了解,资料考据能力,文字校讎能力等。

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研究团队中的年轻学人,不仅具备多数年轻人所有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的特点,还具备只在少数年轻人中才有的扎实功底和端正学风。他们不仅在文学、语言学方面有较深厚的修养,而且对历史、文化、艺术、哲学、美学、管理学、文献学、信息论、传播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独到见解;他们普遍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一只眼睛盯着学术,另一只眼睛盯着实践,努力将学术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又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他们摒绝了浮躁时代的诱惑,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安心于学术。

他们的这些优良品质,正好适应了应用文体的研究需要,同时

也在应用文体的学习和研究中强化和发展了他们的这些品质。

就读于南师应用文体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读期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和出站报告,或奠定了他们的研究基础,或总结了他们的研究所得,或拓展了他们的研究视域,不仅是个人的重要学术收获,也是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研究实绩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紧紧围绕古今应用文体,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涉及到应用文体的作者、种类、形式、内容、演变、文集、制度、机构、办理、传播等很多方面,并向应用文体之外的文化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信息论、文献学、军事外交等方向辐射。不仅展示了应用文体学内涵的丰富性,也展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南师大应用文体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五个“结合”,即古今结合、点面结合、纵横结合、内外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

南师大的应用文体研究从古代公文入手,开拓了一片乏人问津的重要学术领地,借助古代公文深厚的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积淀,提升应用文研究的深度和厚度,进而提升学术层次。所以,选题以古代公文居多。《曹操公文研究》、《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中国古代官署平行公文文体研究》、《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论宋朝外交文书》、《明代公文变革论》、《朝鲜与明清公文比较研究》、《骈体公文研究》、《中国古代秘密章奏研究》、《汉魏六朝公文批评研究》、《从〈赈纪〉看清代荒政文书》、《罪己诏研究》、《白居易公文研究》、《宗教视野下的太平天国公文》、《宋朝弹奏公文研究》、《魏徵公文研究》等都属这类选题。然而,对古代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当代和后代,我们将研究触角伸向古代的时候,一直没有忘却“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努力从古代的应用文中找寻规律和经验,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古今结合”的第一个方面。“古今结合”的另一个方

面,是部分选题直接以现代公文为研究对象,如《公文语体语言研究》、《当代中国公文传播研究》、《公文信息流通机制研究》就属于这种类型,在整体上呈现出古今兼顾的研究格局。此即为“古今结合”。

在这些选题中,有的以某一作者(《曹操公文研究》、《白居易公文研究》)或某一作品为研究对象(《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从〈赈纪〉看清代荒政文书》),有的以某一专题为研究对象(《公文语体语言研究》、《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汉魏六朝公文批评研究》、《训谕文与儒家教育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公文传播研究》、《公文信息流通机制研究》),有的以某类文书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官署平行公文文体研究》、《论宋朝外交文书》、《骈体公文研究》、《罪己诏研究》),有的以某一时代为研究对象(《明代公文变革论》、《朝鲜与明清公文比较研究》)。这些角度各异、侧重不同的选题,又以古今公文为凝聚点,交叉互补,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综合成一个规模宏大、层次丰富的整体。此即为“点面结合”。

有些选题从应用文体学科中切取一个侧面作为专题,对该专题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全程式或阶段性描述,如《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汉魏六朝公文批评研究》,这种研究目力集中、鞭辟入里,体现出深度挖掘的取向。有些选题以某一朝代的公文为研究对象,已经完成的如《明代公文变革论》,已经开题、纳入研究计划的《民国公文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文书工作研究》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研究截取文书史的某一段落,对该时期的文种、作者、形式、内容、制作、办理、相关制度进行全面探讨,呈现出综合概括的取向。以上两种研究取向,一纵一横,形成二维坐标,展示了应用文体学的学术全景。此即为“纵横结合”。

应用文体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边缘性、交叉性。一些选题瞄准应用文体本身,对其重要方面或有典型意义的题目